

ZHEJI WENXUE SHIJIAQUNTI YANJIU

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研究

(1909—1949)

付祥喜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研究

(1909—1949)

付祥喜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研究 : 1909 ~ 1949 / 付祥喜著 .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2015.12
ISBN 978-7-5192-0159-3

I . ①浙… II . ①付… III . ①作家—人物研究—浙江省—1909 ~ 1949 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史学史—研究—1909 ~ 1949 IV . ① K825.6 ②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5557 号

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研究 (1909—1949)

责任编辑 汪再祥
封面设计 梁嘉欣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 S B N 978-7-5192-0159-3/I·0382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文学史家·浙籍文学史家群体

“文学史”一词已为大家所熟习，但“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之名却还显得陌生，有必要加以界说，这还得从“文学史家”的概念说起。

本书提出的“文学史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指那些文学史著作颇丰、曾对文学史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者，也包括仅编写出版过一部文学史著的名不经传者。而这里的“文学史著”，指的是能以书的形式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非单篇论文或论文集），其体例包括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

“浙籍文学史家”仅指祖籍或出生于浙江省的文学史家（包括已离开浙江省而在外地工作的浙江籍文学史家），不包括长期生活工作在浙江的外省籍文学史家。由于在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处境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较大的流动性，所以本书不以文学史家在浙江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概念。

“文学史家群体”，是指在某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写作方面引领潮流、有一定文学史研究绩效且引人瞩目而又有某方面关联的知识界人物。之所以称为

群体，固然因为他们不止两个或少数几个人，但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群落具有自身的特点：成员有共同的目标（编写文学著作，推进中国文学史研究）；成员对群体有某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群体内有结构，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等。此外，群体还具有时代性或阶段性，而群体中又有代表人物能代表这个群体。

纵观中国文学史写作史，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全国较有影响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浙江文学史家数量众多。从清末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浙江陆续涌现的文学史家计有来裕恂、王梦曾、王国维、褚传诰、张静庐、朱希祖、葛遵礼、刘贞晦、沈雁冰、凌独见、鲁迅、刘毓盘、曹聚仁、郑振铎、傅东华、赵景深、许之衡、苏雪林、周作人等。据我们统计，1949年前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400多部），有三分之一出自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之手；1949前，公开出版过一部或多部中国文学史的浙籍文学史家有47人，约占全国文学史家总数的32.4%。除了人数众多，其中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还在中国文学史不同研究领域，尽筚路蓝缕之功，或成为一代宗师。这些，都是全国其它各省文学史家不可比拟的。

“浙籍文学史家群体”，大约萌芽于清末民初、形成于“五四”时期、解体于1949年。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文学史家群体，在中国文学史写作、文学史理论建设等方面展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成员大都是中国文学史观或者某种著述体例的开创者、领銜者，正是他们引领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新潮流，创造了辉煌业绩，为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由于为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主要文学实践活动是写作史著，这里还需说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概念。在本书中，所谓“文学史写作”，主要指编写文学史书，基本上不包括文学史论文的撰写。在“文学史写作”前面冠以“中国”一词，则提示本书考察的是以中国文学历史演变为对象的写作，而且“中国文学史”书并非单指通史，也包括断代史和各类专史。于是，看得出来，本书所谓“中国文学史写作”其实就是学者所说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如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也有研究者称为“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国文学史编撰”或“中国文学史书写”。那么，为何笔者用“中国文学史写作”而不是其他呢？除了考虑到“文学史编纂”或“文学史编撰”容易被误认为属于纯粹技术层面的史料编排，

而“文学史书写”有随便、口语化的嫌疑之外，笔者尚有更深层的思考。这还得从“文学史”一词的定义说起。

迄今为止，海内外学术界对“文学史”的定义，少说有几十种。海外学者的定义，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的，乃众所周知，故不赘述。这里摘录对我国文学史研究影响很大的德国文学史家瑙曼对“文学史”一词的定义，他指出，“文学史”在德语里至少有两种意义：

其一，是指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其二，是指我们的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以及我们论述它的文本。^[1]

瑙曼相信，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一种历时性的关联。有的文学理论家特别是作家，更相信作品和作家之间的独立性，并认为这种独立品性正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区别。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及其追随者，怀疑作品和作家之间存在历时性关联，强调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相信作品和作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我们认为，这种内在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存在是构成文学史研究合法性的基础。瑙曼还指出“文学史”的另一种含义，是指对这种“内在联系”的认识，以及对它的阐述。这两种含义，其实指出了“文学史”的双重属性，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学史，二是作为存在于人们的认识和叙述中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文学史。文学史的误解。遮言之，“‘文学史’就其最直接的涵义来说，一方面它是一种‘史’，另一方面它又是关于‘文学’的历史，应当是‘文学’和‘史学’的辩证统一”^[2]。瑙曼区别了两种含义，把前一种以研究对象方式存在的称为“文学的历史”，而后一种以研究成果方式存在的称为“文学史编纂”。但他没有指出，“文学的历史”与“文学史编纂”之间的关系。如果割裂“文学的历史”与“文学史编纂”之间的关系，将会形成两种“文学史”观：一是把文学史看做是一门“专门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学史就是对文学历史的主观“建构”。“专门史”说的片面

[1] [德]瑙曼：《作品与文学史》，收入瑙曼等著、范大灿编《作品、文学史与读者》，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3月，第180页。

[2] 赵宪章：《文学史的概念与文学的历史规律》，《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性在于，将人类对于文学历史规律的认识等同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以至以文学史的“历史性”掩盖了文学史的“文学性”；“建构”说的片面性在于以文学的主观可阐释性否认其生成流变本身也有客观规律可寻。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文学的历史”是可以转化为“文学史编纂”的，这种转化的行为，就是“文学史写作”。使用“写作”而不是“编纂”或“编写”、“编著”，强调了这种转化行为的主观性和作为行为结果的预设性。它表明，从文学史的第一重属性到第二重，不是完整、准确再现第一重属性，不是对史料的简单编排，也不是对第一重属性的客观摹写，而是融合了预设和想象的“写作”。历史总是后见之明，我们只能从各种已有的残存的片断里获得证据，再通过必然纳入虚构或想象的叙事行为，获得对文学史的认识和了解。因此，用“文学史写作”而不是其他，可以“提醒着我们历史本身虚构的可能，它也提醒着我们，文学不必总是必须依附在所谓实证式社会科学的种种史观之下，成为一种好像总是次一等的历史叙事行为”^[1]。

二、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起

笔者选择“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缘于笔者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发现。大约从2002年开始，笔者就对搜集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产生兴趣，近十年下来，累计的各种史著版本有几百种。在整理这些版本过程中，笔者意外发现，浙江籍的编者特别多，再粗略查看那些浙江籍的文学史家，他们多数人存在诸如师承、亲友之类的关系。笔者于是猜想，这些人会不会像浙江新文学作家那样形成了一个群体呢？接下来，笔者对浙江籍文学史家的进一步考察，证实了这个猜想。这个

[1] 王德威、许子东、陈平原：《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文中所引之语出自王德威。

群体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王国维、鲁迅、郑振铎等还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某方面的开山之祖。既然如此，以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为研究课题，应该是有意义的。

其次，以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为题目，也是基于笔者对国内外文学史写作研究状况的考察。具体如下：

1. 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必须要加强对史著本身的研究

直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史写作才引起注意。那些出自文学史著作者的简短评论，对此后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正式进入研究者视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引发了人们对文学史写作的关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文学史写作理论。受韦勒克、沃伦、海登·怀特等欧美文学史理论家的影响，以下几点渐成研究热点：第一，文学史写作能否再现历史。多数研究者已不再把文学史写作看作历史的真实再现，文学史写作既不等于虚构，又不等于历史。第二，传统的进化论史观和环境决定论受到质疑^[1]。第三，反思和建构文学史写作的述史模式。不少学者一方面对以往的述史模式进行批判性审视，一方面试图建构开放性的述史模式，如葛红兵甚至提议建构反模式的文学史写作^[2]。第四，文学史写作的话语权力。程光炜等以福柯话语理论为支撑，认为文学史写作“构成了一种对权力普遍性的寻求”^[3]。

文学史著述体例和文体类型。认为现存各种著述体例既有特色也有不足，这显然为著述体例的创新奠定基础，但论者并未指明创新的方向。文体类型研究的成果显著，出现了多种有影响的文学史分类法，并引向文学史写作如何处理现当

[1] 参见谢应光：《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

[2] 葛红兵对以往的文学史模式进行批判性审视，指出：可以有一种开放性的文学史，它保持文学史文本及文学史记载材料的零散性、偶然聚合性和不断的分延性，不以一个统一的中心来辐射文学史全程，不以一个统一的逻辑或线索来勾连文学史历时，而代之以一个又一个边缘性论述，让这些边缘性论述彼此构成一张网络，从而在量上构成对文学史全方面的包罗，但在质上保留大量的空白、互交、相悖。葛红兵称之为反模式的文学史。（参见葛红兵：《文学史模式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

[3] 参见程光炜：《知识·权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侧面》，《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文学史观的再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戴燕在其名著《文学史的权力》中也辟专章讨论文学史如何被赋予权力（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代文学“文体互渗”的思考。^[1]

文学史写作的地域性与完整性。此项研究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文学史写作应如何对待地域性与完整性？多数学者赞同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完整性，即要写作覆盖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2]，同时也不宜忽视地域性。但尚未解决如何实现二者统一的问题。

由于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当代如何“重写文学史”，因而对于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缺乏细致、准确的把握。由此也更显出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和黄修己、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较高学术价值。

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而且向系统化、规范化迈进，须改进处有三：（1）对近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研究，大多属理论层面的探讨，关于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具体研究不够；（2）对文学与历史的把握出现偏差，或者偏重“文学”，历史意识薄弱，或者偏重“历史”，“文学性”淡薄（有学者指出，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一书，“文学”的历史意识相对薄弱）；（3）偏重文学史著作的阐释，较少注意作者自身。

我们注意到，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都以文学史著为中心，史著的生产者（史家）只是在论述中作为某种史著的标识被附带提及。有些研究者甚至把文学史著作视为完全自足、封闭的文本，脱离其作者和作者所处时代背景，进行创造性“解读”。无须讳言，这种研究偏向，对文学史学科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三十年来，以文学史著为中心的研究，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已经拥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虽然仍有发掘余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如果文学史写作研究缺乏新的思路，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偏向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也使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本身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那么，有没有新的研究论域值得开拓呢？

——纠正以文学史著为中心的偏向，把目光投向文学史著的作者（文学史家）。

[1] 参见卮荣本：《论文学史的文体分类及其流变》，《江海学刊》（南京）1999年3期，第163—69页。卮荣本在此文中以较大篇幅研讨文体间的交互作用。此外，陈平原对文学史著述体例的思考也值得注意（参见陈平原：《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2] 杨义：《文学史研究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8年第1期。

必须重视文学史家本身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只有在充分研究文学史家文学史观、文学史编写方式乃至生平经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更透地阐释文学史著作。

2. 学术界尚无对文学史家群体的研究

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很早就出现了对文学史家的研究,却长限于对单个或少数史家的个体研究。20世纪中叶,欧美学者将社群理论引入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引发一些学者对文学史家群体的注意,但影响不大,此后不曾推广。

国内对文学史家的研究起步较晚。总体来说,1949年以前我国的研究大多属于印象式的评议;此后迅速学术化,涌现了数目可观的成果,例如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1]一书,就收入了陈泳超等学者对阿英、周贻白、罗根泽、刘大杰、林庚等文学史家的专题研究论文;黄修己考察朱自清与中国新文学编纂传统之间的关系^[2],也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近年的相关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的不足:(1)仅见个体性研究。虽然对文学史家的个体研究,有其特别的优势,但长期滞留于个体,可能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2)很少注意到地域文化对文学史家的影响。

近年学界较关注的,是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其中,以王嘉良对“浙江潮”的系列研究最为突出。尽管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中,部分人本身就是著名现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苏雪林),因而王嘉良等学者的相关成果,为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毕竟二者在研究对象、旨趣等方面不同,因此不能彼此覆盖或替代。

除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研究外,其他地域性文人群体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综观近年地域性文人群体研究,尚有三点不足:一是“泛文化”迹象,过于强调文化对文学的作用和影响;二是视地域文化为客观实体性因素,注重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持续、稳定影响,因而强调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单方面作用,形成一种地域文化与文学封闭式互证的研究模式;三是研究视角多局限于“某地域文学”本身,缺乏更为宏观的整体观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由特定地域文化入手总

[1] 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

[2] 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撰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结中国文学经验和意义的初衷。这三点不足，对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虽然至今尚无对文学史家群体的研究出现，对文学史家的个体性研究却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其中，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分别论及胡适、赵景深、朱自清、周作人、吴文祺等新文学史家，后四人为浙籍文学史家。但，黄先生仍是侧重史著，基本上不涉及对史家本身的考察。而且，限于该书主旨，黄先生未对史家作群体性研究，以致书中出现的新文学史家“各自为政”，难使人们对文学史家有个整体的了解，给人零散的印象，没有揭示文学史家的群体特征。

鉴于上述，从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分割出浙籍文学史家，并将之作为群体展开研究，据此考察群体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影响，仍是目前研究的薄弱之处。

（二）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1. 研究价值

笔者相信，这一研究课题具有以下意义和价值：

首先，由上文研究综述可知，探讨历史沉淀的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以往论说文学研究的现代性，把目光集中在外来学术思潮的影响，对传统与文学史研究现代性关系的研究虽已有所触及，但数量上很少，而且尚未深入，特别是缺乏从一个特定地域的实证论析中把握传统文化对文学史研究发展进程的推动。就此而言，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研究的价值，至少在于它可以为地域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关系的论述提供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证。事实也如此。若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比作星空，可以说，没有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竞相辉映，它将失去灿烂的景观，如果把中国文学史写作比作一条历史长河，则没有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推波助澜，就不会有“中国文学史”写作从无到有、迅速获得广泛认同、遂成一时风尚的巨大气势。研究这种在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探究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成因及其特征、存在的不足，通过对代表性的文学史家的个案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由此观照中国文学史写作发展的轨迹及其规律，这些都有极重要价值。

其次，在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并不缺乏对单个或数个文学史家的个案考察和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总结，但尚未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探讨文学史家群体及其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关系。因此，本书试做探讨。

再次，当然，这一选题的更需提及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中国文学史学史上一种重要现象的梳理与描述，是以浙籍文学史家作为典型例证讨论中国文学史写作建构历史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以王国维、鲁迅、郑振铎等领衔的浙籍文学史家群体，阵容壮观、成就卓著，而且，这个群体的成员大都是某种文学史观、文学史类型的开创者、领衔者，正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新潮流，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为推动中国文学史写作发展、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探讨浙籍文学史家群体这一现象，其意义不只是在揭橷地域性文学史写作经验，还可以在地域文化传统与整体的互动关系中挖掘出许多对于总结中国文学史写作规律具有观照意义的东西。

最后，本选题属于浙江学术史研究内容，这一选题将拓展浙江文化研究的领域，衍生出诸如两浙人文传统与百年浙籍文学史家文学史写作，以及对王国维、鲁迅、郑振铎等浙籍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写作思想的深层解读等新课题。

2. 研究价值

虽然相关研究硕果累累，但对浙籍文学史家群的研究尚未出现，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研究也还有进一步开拓的必要。本书试图从四方面改变这一研究现状：

(1)从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分割出浙籍文学史家群体，对这一部分展开研究，一方面可以提供文学史家群体研究的个案，一方面可以探讨地域性文学史家群体如何介入并影响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国文学史写作整体格局又是如何规约地域性文学史家群体，进而明确浙籍文学史家群体和中国文学史写作整体格局的历史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2)通过对浙籍文学史家群生成的研究，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地域人文传统及其对中国文学史写作发展的驱动；

(3)深入了解从而明确浙籍文学史家群体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贡献，这种对文学史写作主体的重视，彰显学术史研究对人文精神的关照；

(4)为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作，提供一些理论和历史经验上的支持。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主要内容

本书在体例上采用金字塔式的开放性结构。全书分作上、中、下三编。上编为通论，从宏观上论析浙籍文学史家群体形成的地域文化因素、群体基本状况、个性特征及其局限，它是构成全文的“塔尖”；中篇为专论，以专题的方式探讨“中国俗文学研究中的‘浙江派’”，它构成全书的“塔身”；下编“文学史著编年研究”，以编年研究方式展现浙籍文学史家群体所著“中国文学史”的作者简况、初版年份、版本信息、写作背景、写作过程、书评、目次等，为前两编提供基本的文献材料，它是构成全书的“塔基”。这样，由下往上，一层支撑一层，一层统领一层，从而构成既独立自存又环环相扣的开放性文本。

以下简述各章主要内容。

上编通论由四章组成，第一章“地域文化传统与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崛起”主要论述了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在浙籍文学史家群体崛起中起到的作用。从地域文化视角审视这个群体的生成，应是此地浓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延续，也与这一群体抓住了历史机运提供的文化先机有直接关系。此外，细察浙籍文学史家的治学和文学史写作精神，不难发现有浙江地域文化品质的驱动。第二章概论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基本状况。主要介绍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规模与重要成员、地理分布以及这一群体的关系网络。认为，教育经历、地缘关系和报刊出版机构等构成的关系网络，是这一群体得以聚合的人事关系方面的重要原因，也成为群体成员间得以聚合的纽带。第三章归纳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个性特征及其局限。第四章将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置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以回顾、总结其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中编以专题的方式探讨“中国俗文学研究中的‘浙江派’”。在2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鲁迅、郑振铎、赵景深、杨荫深等在中国俗文学史研究史中形成了一个

前后相继的“浙江派”。为了解和展示这一派别，本书从他们各自某方面的成绩出发，管窥“浙江派”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的贡献。

下篇以编年体的方式展现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之中国文学史写作状况。此篇并非简单罗列中国文学史著作，而是通过考述作者简况、初版年代、版本信息、写作背景、写作过程、书评、目次等，厘清相关史实，藉此还原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中国文学史写作过程的丰富与复杂。

结语部分，在全书基础上总结浙籍文学史家群体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地位和影响。浙籍文学史家群体以其文学史写作实践，为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群体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反思新时期如何“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二）研究方法

本书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大量阅读、运用相关文献史料为基础，借鉴学界已有的社群理论、地域文化研究理论等资源，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将一般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社群研究学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定量研究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浙籍文学史家群体，揭示该群体的文化背景、文学史写作的生态环境，探讨其与中国文学史写作之间的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材料的选取极其重要。本书既然研讨的是文学史家群体，必然要以文学史著作作为主要材料。在这里，所谓“文学史著作”，包括浙籍文学史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几乎所有文献史料信息，即：作者（文学史家）生卒年、姓名、字号、笔名、籍贯、生平、著作、版本、书评、目次，以及不少重要著作的前言、后记、附录、译者、插图，等等。藉此全面、如实地呈现 20 世纪浙籍文学史家的文学史写作状况。以文学史著作作为主要材料，体现了笔者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文学史研究转向的忧虑。由文学的“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转向，或曰由“语言论诗学”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固然有其必要性，也有其不容否认的积极意义，但过于关注“外部研究”，作品或文本反而成为附带品，这样的文学史研究，可谓舍本逐末，实应引起人们的警惕。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下编“文学史著编年研究”拟以文学史著作为主体，采用编年研究方法，展现 20 世纪浙籍文学史家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以文学史著作为主体，是因为，文学史写作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作者和著作，而对作者的研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著作。采用编年研究，是为了在凸显时序的前提下，让材料“说话”，真实呈现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脉络，辨析其源流。

所谓“编年研究”，既是一种著述体例，也是研究方法。作为著述体例，编年研究融合编年体与学术研究著作体例，“编年”和“研究”是这种体例的两个特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编年研究切合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以史著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特点，以“编年”为主体、“研究”为辅助，藉此能够让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文献研究方法和史著评价在编年之下各尽其能。^[1]

[1] 关于“编年研究”的详细阐述，请参见本书附录《“编年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

目 录

前 言

- 一、文学史家·浙籍文学史家群体 / 1
- 二、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4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10

【上编】通论

第一章

地域文化传统与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崛起 / 14

- 一、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 / 15
- 二、历史机运提供的文化先机 / 18
- 三、地域文化品质的驱动 / 23

第二章

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基本状况 / 27

- 一、主体构成 / 27
- 二、亲缘、地缘、学缘：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关系网络 / 34

第三章

浙籍文学史家群体的个性特征及其局限 / 39

- 一、群体的个性特征 / 39
- 二、群体的局限 / 44

第四章

20 世纪前期浙籍文学史家群体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 48

- 一、文学观由泛及纯，文学史观从退化史观、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 / 49
- 二、文学史料不断丰富、拓展，为文学史写作奠定基础 / 59
- 三、述史模式的形成与僵化 / 71

【中编】专论

2

第五章

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78

- 一、郑振铎“俗文学”概念在理论上的狭义性与实践上的广义性 / 80
- 二、搜集、收藏和出版俗文学研究资料 / 84
- 三、对俗文学的评价 / 89

第六章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 / 93

- 一、引言 / 93
- 二、搜集整理文献史料：早期的学术准备 / 96
- 三、《中国小说史略》的成绩和不足 / 101
- 四、小结 / 115